

ZHONG
MEI

GUANXI DE HUANGJINSHIDAI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1972—1992)

院图书馆

712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ZHONG MEI RI GUANXI DE HUANGJINSHIDAI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1972—1992)

本书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美】傅高义 【中】袁明 【日】田中明彦 主编

归永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美]傅高义,
[中]袁明,[日]田中明彦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229-00440-8

I.中… II.①傅…②袁…③田… III.①中美关系—
国际关系史—研究—1972~1992②中日关系—国际关系
史—研究—1972~1992③日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
究—1972~1992 IV.D829.712 D829.313 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9629号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

ZHONG MEI RI GUANXI DE HUANGJIN SHIDAI(1972~1992)
[美]傅高义 [中]袁明 [日]田中明彦 主编 归泳涛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李莹 杨亚平

责任校对:周玉平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5 字数:186千字 插页:2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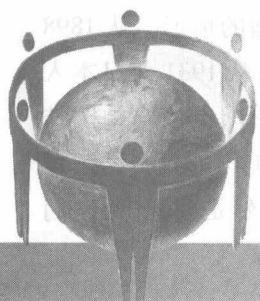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册

ISBN 978-7-229-00440-8

定价:24.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美]傅高义

东亚不仅缺少像北约和欧共体那样强有力的地区性组织,而且缺少欧洲国家拥有的合作基础,这种基础来自于罗马法、拉丁字母和基督教等共同的遗产,来自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几百年历史,还来自于它们在国家大小和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虽然东盟(ASEAN)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促进了地区合作,但是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些结构松散的多边机构还不可能强大到足以提供一个地区安全框架的程度。在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地区组织的情况下,东亚要实现和平与繁荣就必须依靠主要大国的合作: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合作。这三个国家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它们在历史、价值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上迥然不同。当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领导着一场革命,中国正变得日渐强大,而日本又忙于改革它的制度时,在这三个国家之间维持建设性关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曾经有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972~1992年,美国、中国和日本彼此之间都保持着积极的关系。这一特殊的时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出现的,它又为什么结束了?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合作模式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不安之后,还有多少被保留了下来?没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条件,当时那种积极合作的精神还能不能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汇集了美、中、日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意在探寻这一特殊时代的本质以及它的起源、发展和终结。

1972~1992年的这段时期与其之前的百年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

一时期没有出现三个大国中的两个联合起来对抗第三国的情形。从 1898 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和美国联手对付中国。但是,从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先是与中国合作,继而与中国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后来形势再次逆转,1947~1972 年,美国与日本结盟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苏联。1992 年以后,日本和美国仍然是盟国,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却紧张而又摇摆不定。

一、奇特的不对称三角形

直到现在,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主要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去处理与其他两国的关系。因此,如果要追溯 1972~1992 年它们是如何设想并构筑了相互间的关系,那就必然要考虑这些双边关系的实际情况。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在 80 年代,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它的经济与美国经济以及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到了一起。同时,随着中国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合作,它的政治影响力也上升了,这意味着日本和美国如果不考虑中国的作用,就不再能有效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双边政治与安全关系了。所以,尽管这三个国家仍然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去思考自己与其他两国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三角。本书所依据的一个假设是,为了更多地关注这种新三角关系的现实和它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转变从前的观念。

这是一个奇特的三角形,它不对称,而且变化不定。它的三个角(三个国家)和三条边(三种双边关系)不对称,它的整体性质(这三个国家共事的能力)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参与国际贸易或国际政治。伴随着 70 和 80 年代的对外开放,中国开始接受既存的地区及全球合作的基本框架。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优先考虑的事情显然是鼓励国内经济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通过进入外国市场,中国希望出售它的原材料和工业产品,以便获得资金来发展新的投资、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技能。在经济起飞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到 80 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90 年代,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加入世贸组织(WTO)后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国现在拥有



很多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他们能够分析全球发展的趋势,参加国际会议的讨论,这为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遍布全世界的华人网络使中国能够更快地获得信息、投资、技术和管理技能,但同时也使中国与那些对华裔公民的忠诚有疑虑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然而,即便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 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沿海地区正迅速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标准,但内陆地区却远远落在后面。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中国开始为军事现代化打下基础,但它在军事技术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拥有核武器、导弹和一支上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在人数上位居世界前茅,这样的军事能力与较小的邻国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早在8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军事现代化的前景,中国的广袤国土和悠久历史,以及中华文明昔日的成就和对未来的雄心,都让其他国家把中国当做一个未来的大国来对待。到80年代,即便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主要大国,也开始担心一个力量不断增长的中国会做些什么,这样的看法在90年代变得更加突出。

日本与中国、美国不同,它是一个较小的岛国,没有作为大陆强国处理重大的国内多样性事件的经验。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先于其他亚洲国家实现了国内统一和现代化,这使它获得了远远超越亚洲邻国的技能、知识、资本和技术,即便在全球层次上也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较早地取得了军事现代化的成功,加上亚洲存在的力量真空,日本在1894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走上了征服和殖民的道路。即使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残留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针对日本的敌意依然限制着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和力量。日本军国主义也在国内留下了遗产,那就是造成了日本人对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消极反应,这种倾向又因为二战后占领当局制定的“反战”宪法而被进一步强化。这一遗产限制了日本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潜在的进攻性武器。

限制自己成为“正常军事大国”的政策没有让日本遭受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安全条约,从而获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并得到了美国在日本受到攻击时提供支持的保证。作为交换,日本为美国驻在亚洲的军队提供资金、后勤支持和军事基地。来自地区和国内两方面的反对军

国主义的力量,加上美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使日本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建立机构和培养人才,以便积极地思考如何塑造国际体系的问题。另一个后遗症是,人们普遍地对日本感到失望,因为它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与其经济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相称的政治角色。

此外,日本目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了停滞:国内的冷战政治结构已经崩溃,那些曾经非常适合于增长的早期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如今却难以适应飞速变化的全球化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很多日本人还悲观地认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可能会被中国取代,后者能够把廉价劳动力和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政治作用也在不断增大。然而,日本毫无疑问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当然还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可以为自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活标准和仅次于美国的现代技术而感到自豪。我们还不清楚日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克服它面临的困难,但在1972~1992年这段时期,日本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似乎已经作好超越美国成为现代技术和全球资本来源的准备。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高科技、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以及军事能力等方面拉开了与自己最强劲对手的距离,但在80年代末,美国在高科技以及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控制方面却面临着被日本超过的危险。9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汽车、软件、电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成功地从日本手中夺回了优势。美国主要大学和智囊机构的领先地位、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早在70和80年代就已经得到确立。到了世纪之交,唯一的挑战者似乎成了中国,但在80年代主要的挑战者看起来仍然是日本。

尽管美国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在亚洲广泛的贸易、投资和学术领导作用,它在太平洋地区的驻军,以及它自1941年以来对该地区的安全所作的持久承诺,使它成为了一个亚洲大国。但是,美国领导人的关注是全球性的,不可能像亚洲的大国那样把精力集中在亚洲,美国也没有强大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维持权力。在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美国强烈地感觉到在处理全球经济、能源和安全问题时,需要依靠日本的合作。

然而,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关系仍然是不均衡的。美日关系要牢固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安全同盟,而且是因为从20世



纪 40 年代末以来,两国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建立起了联系。相互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也在两国的所有部门和主要地区之间发展了起来。

中日关系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成分,这源于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上的接近,源于它们共同的儒学、佛教和使用汉字的传统,也源于它们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交往。如果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阻碍了两国人民之间个人关系的发展,也限制了日本可能对中国采取的主动,那么中国爆发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也使许多日本人保持低姿态,并谨慎地接近中国。但是,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相互作用的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他们都发展起了有效的工作关系。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在中国的东北和上海这两个日本殖民主义势力渗透最深的地方,双方的交往也更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日本来说美国仍然比中国重要得多。

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美中关系尽管不算亲近,但基本上是积极的,彼此在对方眼中的形象也相当不错。其中,战略因素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到了 90 年代,这一关系才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变得不稳定了,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压力团体”的显著目标,台湾地区的政治变化和一部分人的独立要求造成的复杂局面,美国的防卫战略家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使用其日益强大的武力,以及对中国对美国批评的反应等。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国内的自由度在不断地扩大,然而,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却大大增加了,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二、建设性三角关系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家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首先确定主要敌人,然后寻找对抗主要敌人的潜在合作者:1931~1945 年,主要敌人是日本;从 1945~1949 年,是中国国民党;从 1950~1969 年,则是美国。但在 1969 年,中国与苏联发生了两次边界冲突,并有可能遭受苏联的进一步侵犯,于是中国得出结论:主要敌人是苏联。为了降低苏联进攻的危险,提高其他国家帮助中国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开始改善与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的关系。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起初无须与美国政府内外协商就可以决定对华政策,在他们看来,中国既可以成为对抗苏联的有用盟友,也可以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于是,20 世纪下半叶最扣人心弦的一场外交努力拉开了帷幕,周恩来和基辛格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支持下,开始为美中联合对抗苏联奠定战略基石。在这一过程中,基辛格和他的中国合作者在范围广泛的全球问题上交换了意见,通过确认共同利益的领域,搁置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双方构筑了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当基辛格在 1971 年秘密飞到北京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时,日本一开始感到被出卖了。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曾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限制自己与中国的贸易。突然间,美国领导人不通知日本就奔向北京。一些日本分析家解释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敌意来源于对中国市场的激烈争夺,基辛格秘密外交的意图,正是想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市场之际占得先机。事实上,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没有通知日本,连自己的国务院都没有通知。他们保守秘密的真正原因是,不让与国会合作的中国台湾的游说团体利用任何可能走漏的消息破坏他们的计划。尼克松精明地估计出,访华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将迫使国会追随他的脚步,而他本人坚决反共的信誉也使他不必担心被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这一标签从 40 年代末以来一直困扰着民主党人。

尼克松访华的决定一经宣布,美国对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限制也就顿时结束了,日本急切地想要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在战后日本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佐藤荣作与中国关系不好,没能达成和解,他很快被一位新的首相田中角荣取代,后者实现了与中国的合作。为了确保不落后于美国,日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然而,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算起,美国用了 7 年时间才达到同样的目标。

在“建设性三角关系”的年代里,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旦地缘政治的战略把它们联结到一起,它们在经济、文化、学术和地方团体等方面的关系就开始发展起来,一开始较缓慢,后来速度逐渐加快。1971~1978 年,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信任的增强为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为了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从中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扩大自己的出口市场,以便



增加收入,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本。1978年12月,中国宣布了它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在同一个月,它和美国一起公布了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换句话说,邦交正常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开始于1979年1月,这绝非偶然。

三、建设性三角关系的毁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政治关系突然终止了,起因是苏联解体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高速增长引起的焦虑。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美中友好和中日友好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由于对苏联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领导人都不再给予相互合作最优先的考虑,也不再在可能导致分裂的问题上克制自己的反应。

苏联的解体也使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像亨利·基辛格强调的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混合了地缘政治战略和对美国价值观的伸张。比如,西奥多·罗斯福为扩展美国的力量提出了坚定的地缘战略设想,而伍德罗·威尔逊则坚决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为获取地缘政治目标而支持独裁者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随着“冷战”的消亡,地缘政治的压力变得不那么紧迫了,现在,美国可以更多地关注价值观了。

当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它的经济和军事似乎还太虚弱,不足以对美国和日本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它在国民生产总值、贸易、技术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可预见的增长趋势,到90年代时已经引起了美日两国的忧虑。那些负责分析哪一个大国可能会构成潜在威胁的美国官员们,自然地把中国列入他们的名单。同时,像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机构也开始根据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根据某个特定国家在当前汇率下的购买力,去衡量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这一新的计算标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往标准下的数值要高出3~4倍。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推算的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很快超过日本,并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事实上,购买力平价并不是衡量一国经济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的适当标准,但是,这一新标准下的数值却在美国和日本加剧了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普遍担忧,从而限制

了发展积极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民族认同中,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这促使北京强烈地反对台湾谋求独立的任何企图。北京的官员们确信,他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台湾的军事威慑。美国尽管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很久以来一直公开强调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美国还保证,如果大陆突然发起进攻的话,它就会出兵保卫台湾。围绕台湾问题的这种僵局进一步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了双方发生严重冲突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来自美国以及在较少程度上来自日本的新压力作出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中国认识到,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还有限,这些都限制了它对西方的批评,也促使它寻找防止美中和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途径。

就像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和80年代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三国针对彼此的政策不再由一小群精英决定,而是涉及政府的更多部门、国会以及更多的私人团体。1972~1992年这段“三角关系的黄金时代”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遗产,是这三个国家之间各种类型关系的巨大发展。那些深深扎下根来的团体间活动——企业的、学术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和地方团体的——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不稳定时期,它们在抑制分裂倾向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本书的结构

(一)国内政治

本书的前三章分别追溯了影响美国、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环境。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完成第一章后不久就因癌症离开了我们。他在文中探讨了美国对华和对日决策日益复杂化的过程,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外交政策政治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企业和市民团体更广泛的参与。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逐渐失去了一致性,而“冷战”的结束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奥克森伯格曾是吉米·卡特总统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亚洲政策顾问,他作为一个知情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现了政府各部门



在制定亚洲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章百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他的父亲是一位深受敬重的外交家,在中国与英语国家打交道的外交使节中被尊为“泰斗”。章百家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中国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但他指出,关键的国内因素是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和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接着,他阐述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于1978年,到1985年基本完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视。尽管1978年上台的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他的确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和毛泽东不同的是,他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

神谷万丈是日本防卫大学的教授,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神谷在文章中追溯了中曾根康弘这位在过去20年中最强有力的日本首相,是如何为制定更大胆的外交政策和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作出努力的。尽管中曾根有着清晰的外交战略头脑,他的5年任期(1982~1987)按照日本的标准也已经相当长久,但他还是没能对日本社会中的潜在共识产生多大影响,这一共识倾向于支持牢固的日美同盟和日本的有限军事角色。与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毛泽东和在中国外交决策中有着很高权威的邓小平不同,即使是中曾根也没有多大空间去改变日本的外交政策。虽然自民党在中曾根离任以后已经步履蹒跚,并最终在1993年失去了政权,但基本的外交政策共识仍然存在。这些年的重大变化,比如开启通向中国的大门,并不是国内因素造成的结果。

(二) 美中关系

罗伯特·S. 罗斯(Robert S. Ross)和贾庆国分析了美中关系。罗斯是波士顿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他明确指出,“冷战”战略不仅为美中和解创造了机会,而且使得国内政治成为相对不重要的因素而退居一隅。美国希望在越南战争以后调整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并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尼克松访华后开设的联络处,有助于促进沟通,其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到1979年终于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大使馆。尽管华盛顿在水门危机中陷入混乱,但基辛格的介入为福特总统的整个任期提供了连续性,对华政策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影响。然而,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比中国期望的要长,直到卡特政府时才得以完成。尽管里根在上台时表明他对

台湾的支持,但他很快与中国大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执政时期,与中国大陆的安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着眼于美中关系在有限合作与有限冲突之间的反复转换。他描述了限制美中关系改善的主观和客观形势,同时指出深层次的共同利益使这一关系不至于走向严重的恶化。当苏联和美国接近于核均势的时候,中苏关系得到改善,原因是中国的分量现在能够改变战略平衡。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中关系也一直存在问题:美国比中国更愿意接受与苏联的缓和,而中国则不愿接受美国让它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打消了台湾方面的疑虑,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美中关系的恶化仍然在限度之内,因为双方政府都认为,避免双方关系的恶化是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的。

(三)美日关系

杰拉尔德·L. 柯蒂斯(Gerald L. Curtis)教授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他回顾了基辛格和尼克松领导下的决策集权化和他们的秘密外交对美日关系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对贸易问题和美中关系的影响。基辛格向中国人解释说,美日安全同盟是阻止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最好办法,从而说服中国接受了这一同盟。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对美日同盟的坚决支持巩固了积极的美日关系的基础(“罗-康”一词象征了当时的情形),这有助于弥补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当时日本的贸易顺差正迅速增长,许多美国工业部门已经输给了它们的日本对手。尽管安全同盟仍然十分稳固,但围绕贸易问题的紧张关系,加上美国的行为方式——施加更大的压力,却损害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好。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考察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意义,即出口增长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美日贸易关系的紧张局面不断加剧,美国又在突然改变对华政策时没有事先通知日本,但美日关系仍然相对稳固。日本参加了1975年开始的全球峰会,这标志着它愿意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美国对此感到满意。这两个国家开始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四) 中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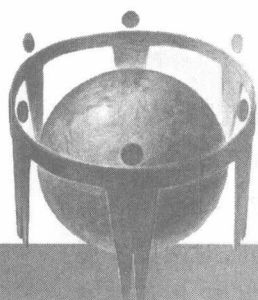
张沅生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父亲曾在中日友好协会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中日关系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1972年中日邦交一经恢复,双方的互动与合作就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包括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双边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地方友好城市和省际交流。这一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1992年,江泽民主席和明仁天皇分别访问了对方的国家,把双边关系推向了高潮。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经济问题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上的分歧,到90年代中期成为使双边关系趋于紧张的因素,但在70和80年代,它们都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添谷芳秀指出,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把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放在全球战略的框架中思考;相反,日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巨大而特殊的邻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史,曾经而且必将再次在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很多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都感到美国突然与中国和解是背叛了日本,因而迅速采取行动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为了保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不被动摇,仍然保持了与美国的密切合作。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新的安全环境,这使得日本和中国终于在1978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由于中国坚持要在条约中加入“反霸”条款,而日本却不希望恶化它与隐含的霸权国——苏联的关系,所以谈判一直拖到了1978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的问题出现之前,这一条约使积极的中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目 录

ZHONG MEI RI GUANXI DE HUANGJIN SHIDAI

序言	1
[美]傅高义	
第一章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	1
[美]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第二章 中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	19
[中]章百家	
第三章 日本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	31
[日]神谷万丈	
第四章 美国的对华关系	53
[美]罗伯特·罗斯	
第五章 中国的对美关系	80
[中]贾庆国	
第六章 美国的对日关系	102
[美]杰拉尔德·柯蒂斯	
第七章 日本的对美关系	129
[日]中西宽	
第八章 中国的对日关系	150
[中]张沅生	
第九章 日本的对华关系	168
[日]添谷芳秀	



第一章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

[美]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与中国、日本同时建立起了建设性的关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突破得以实现,是因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一小群顾问作出了一项战略决定,即结束越南战争,并积极回应中国试图联合美国一起对抗苏联这一共同威胁的愿望。

1971 年以后,随着美国与中国联系的扩展以及与日本在贸易摩擦的升温,更多的政府部门和公众开始卷入到东亚政策中,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也就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1978 年后,中国决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美中两国同意实现邦交正常化,这就增强了决策过程复杂化的趋势。华盛顿的气氛以及美国的决策过程又因为标志着“冷战”结束的一系列事件而进一步发生变化。

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已经比它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但美国对日政策的决策过程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直到 1971 年,美日关系还是由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官员中的少数人决定的。但是,随着 1969~1971 年美日纺织品贸易摩擦的爆发,对日贸易进一步陷入美国的国内政治中,美国国会的作用由此增大。此外,日本经济的膨胀也使那些关涉全球经济的行为者(如能源部门等)开始在对日政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继续处理与日本的安全关系,但日本对美出口的增长影响了美国国内更加广泛的经济和地方利益,这使得各种各样的“压力团体”和国会日益涉足美日间的贸易问题。

一、美国的决策过程和美中关系的扩展

1949 ~ 1969 年,美中之间充斥着敌意。这两个国家的相互隔绝不亚于 20 世纪任何两个大国之间可能达到的隔绝程度: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贸易,几乎没有外交接触,各自的军队都视对方为死敌。而 1970 ~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终于打开了僵局。在随后的 30 年间,对两国发展积极关系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升高,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失望、挫折甚至相互责难。尽管两国关系摇摆不定,但 20 世纪 70 年代那种仅限于太平洋两岸一小部分范围和一小部分人员之间的相对狭窄、简单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到 90 年代,这一关系已经发展成一种关涉几十亿美元和重要战略利益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那些起伏波动往往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但实际上发生的故事却是美中关系进一步陷入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当中,从而不断地复杂化。除了围绕台湾问题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以外,这种关系似乎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脆弱了。然而另一方面,双方也都无法形成协调一致、前后连贯的政策,而且这一状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事务只是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少数政府官员管辖。只有人数很有限的几位国会议员[如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和众议员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ay)、约翰·布莱德姆斯(John Brademas)]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感兴趣。在民间,有 4 个团体专门从事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活动,它们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China Relations),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 S. -China Business Council),国家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中美友好协会(the U. S.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还有一部分关注领域更广泛的团体,比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Churches)和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也涉足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新闻记者从香港报道中国,或者去中国作短暂的旅行。一些商人和律师仅仅为了两国关系所能提供的有限的商业机会,长途跋涉到广州和北